

# 一部精心镌刻的民族史诗

《你在高原》是张炜用生命的全部力量完成的心血之作。为了写作此书，张炜划定了一个区域，几乎走遍了那里的山山水水。对那里的每一座山脉、每一条河流，他熟悉的程度不亚于任何一个当地人。他了解了城市和村镇的总体状况，目睹了不同阶层的生活状态。他还利用出国的机会，多次考察了美洲和欧洲的发达国家，以及亚洲邻国日本、韩国和我国的港澳地区等，将当中国置于整个世界的体系中研究、比较。在知识储备方面，他自修了考古学、植物学、地质学等专业学科，密密麻麻地记下了数十本田野笔记，仅搜集的民间资料就有几大箱子。把自己封闭在深山的陋室中，不停地读着写着，废寝忘食，他甚至在遭遇车祸、术后疼痛难忍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写作……正是凭着这样一种认真认真的态度，他才能耐得住寂寞，在漫长的20多年中倾心打造这部巨著。

在《你在高原》的整个出版过程中，作家出版社组织了一流的编辑团队，调动了最好的出版资源。具体说来，这部作品是由5位编辑共同负责编辑的，分别是应虹、姜琳、林金荣、黎云秀、张亚丽，每人负责其中的两本书。《你在高原》究竟是怎样一部作品，我们不妨听听作家出版社不止一遍认真研读过这部作品的责编们的心声。

应虹说，张炜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作家，他一直在认真、本分地写作。他对文学的信仰，他对文字的迷恋，在这代作家中是典型。作家出版社跟张炜的合作很多，因为我们都是

为了给读者贡献纯文学精品。《你在高原》内容非常庞大，虽不能说每部都很经典，但整体质量上是整齐的，其中至少有几部应该是中国当代文学长篇小说中的精品。

姜琳说，《你在高原》需要沉下心来慢慢看，其中有些段落我看了好几遍，脑海中常有挥之不去的片段。我对其中描写到的家庭磨难、时常感同身受，能与之产生共鸣，还有对底层人物的描写，唤起了我很多回忆。尤其是《忆阿雅》，很容易勾起读者内心深处不愿意轻易触碰的东西。编辑这部作品，我自己都感觉到很神圣、很虔诚。

林金荣说，编辑《你在高原》是一次分量很重的工作。由于面对的是作者呕心沥血20年的心血，所以在整个编辑过程中，我都怀有无比崇敬的心情。张炜的作品内容丰富、手法多样，而他对民生疾苦的体会是超出常人的。这种巨大的精神痛苦深深地埋藏在作者心中，又流露于字里行间。阅读作品，给我的整体感觉既压抑又向往，折服于作者的创作才华。

黎云秀说，《你在高原》是一部我们期待已久并感觉非常难得的大作品。尤其是《你在高原》中的《无边的游荡》这部小说，作者通过塑造一组肉体与灵魂的游荡者形象，让人读后感觉欲罢不能。总之我觉得张炜的作品文字很好，整体感觉十分厚重、立体。

张亚丽说，面对商品经济大潮的冲击，是坚守纯文学的立场，还是紧跟市场潮流而动，对每个文学编辑来说都是一场考验。我们一直在寻找和发现那些真正能够记录历史声

音、对时代负责和担当的文学作品。这类作品一定不是迎合式、炫耀式的，而是孤独的、执著的、坚守的、骄傲的，正因为它对文学理想高地的坚守和对生命体验的无限逼近，才使其拥有了得以穿越历史的可能性。《你在高原》无疑属于这类作品中的翘楚，作品中所体现的直面人生、探寻历史和人性真相的勇气，应该得到读者的尊重。

作为稿件的终审，杨德华同志为该作品的出版可谓呕心沥血，遗憾的是不久前他因病英年早逝，没能等到该书获奖的消息。杨德华生前在《张炜〈你在高原〉审稿六记》中谈到，在消费主义肆行无忌的今天，张炜能够在长达二十几年的时间里，以如此巨大的篇幅沉湎于历史、自然、人性、传说、哲学、宗教的诸般思索之中，不得不让人佩服他强大的道德勇气。小说描述了一个民族长达百年的苦难与救赎的伟大记忆，是一部精心镌刻的民族史诗，拥有百科全书般的容量和质地。全书包含了大量精妙的细节、几十个性格迥异的人物，无数的重大场景和历史传奇，那广阔的格局与缜密严谨的细部，几近两极状态，却能够形成深层的和谐与完美。张炜语言精致细腻，运思绵密邈远。

最后，编辑们谈到了在编辑过程中如何保持这套书稿的统一性的问题。由于这部作品规模庞大，作品创作和修改的时间跨度长，作者不易在情节、语言等方面达成统一。这给编辑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与作者的多次沟通中，编辑们尽可能地达成一致的修改意见，规范化全书的格式，统一了全书的字词。在处理一些方言土语和作者习惯使用的词语时，除了那些语言工具书有规定用法或有明显文法错误的，编辑们决定尊重作者，不再改动。虽然是10卷，却是有机相联的一部大作品，所以整体的风格，包括字词，编辑们都尽量做到统一。（本文系记者采访作家出版社相关编辑后整理）



## 获奖作品

## 责任编辑手记

我与《推拿》  
□胡玉萍

《推拿》获得茅盾文学奖，作为该书的责编我非常高兴，也为毕飞宇长时间以来所坚持的深厚人文关怀与严肃的创作态度，终获中国文学长篇小说的最高奖项而表示由衷的祝贺。一分耕耘，一分收获，我把《推拿》这部小说的获奖当做自己坚守职责、辛勤工作的一份回报。

与毕飞宇相识有十多年了，那是上世纪90年代的事。自1977年起，人民文学出版社每年都要编选和出版年度短篇小说选和中篇小说选，这两种年选在文学界和读者中具有广泛影响。1995年我接手编选短篇小说年选。自那以后几年的编选工作中，我阅读了大量中短篇小说，结识了许多作家朋友。在1993年《钟山》第6期，我读到了毕飞宇的短篇小说《祖宗》。小说中的故事给了我强烈的震撼：百岁太祖母终年沉默，不让儿子踏进她的卧房，用为其准备的棺材睡觉，并要求把早逝的儿子埋在床底下，后来她长出了一口闪着化石般光芒的牙齿，吓得儿子欲除之而后安。在一种阴森恐怖的氛围中，儿子们为百岁太祖母拔牙，太祖母的牙被拔掉后流血不止而死。从这篇小说中，我读到了毕飞宇的独特才情与创作潜质，为他那清俊的文字、略显艰涩的节奏和快若闪电的文句转换而惊叹。从此，我就慢慢打听、寻找与毕飞宇联系方式。那时没有手机，只能通过写信相互联系。后来，我们有些熟悉了，就记下了彼此的电话，也算有了固定的联络方法。2001年4月，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在北京召开，我第一次见到了毕飞宇。对我说，你给我们写部长篇吧，我很喜欢你的作品。毕飞宇说，好，写好了就跟你联系。这中间，我读了他的《青衣》《玉米》《玉秀》《平原》等多部短、中、长篇，还将他的《青衣》《雨天的棉花糖》选入我社的“九元丛书”。毕飞宇始终把我俩当初的约定记在心上，《推拿》完成后，虽然有多家出版社索稿，并给出相当高的条件，他却没有动摇，坚定地把这部小说的文稿交给了我们出版社。

说来也巧。我正在编发《推拿》时，2008年残奥会在北京召开。开幕式上，盲人歌手杨海涛演唱了一首《天域》：“歌声里白云在蓝天飘过，歌声里鲜花在草丛中开放，歌声里美丽的姑娘来到我的身旁，歌声里我走进广阔的天地。”杨海涛的声域是那么宽广，音色是那么淳厚，愿望是那么美好。在欣赏音乐的同时，我也在琢磨《推拿》里所描述的故事、人物与盲人们的生活。那两天我又从电视上看到，在《艺术人生》中杨海涛走近观众，他动情地说，他和弟弟自生下来都是盲人，为了他俩，原本贫穷的父母历尽艰辛。但是他和弟弟长到这么大，都不知道父母长的是什么模样。坐在旁边弹奏钢琴的金元辉说，杨海涛初到音乐学院时，老师教他弹《蝴蝶》，他怎么也弹不好，老师就启发他，你想一想蝴蝶怎么在草丛中飞，怎么翩翩起舞。杨海涛说，老师，我从来没有看到蝴蝶，不知道它们在草丛中如何飞舞……听到他们的讲述，用心体会杨海涛演唱的《天域》，我不再是欣赏，而是心酸，是心疼，是深深的感动。杨海涛的话语对我心灵的触动非常之大，在编发《推拿》的整个过程中，我努力体会着盲人的生活和情感，将自己融入到这部作品中。

《推拿》向读者第一次展示了现实生活中盲人按摩师私密而真实的世界，展现了人们甚少了解的盲人群体的另一种人生悲喜。在小说中毕飞宇尤其强调的是，残疾人、盲人有着和健全人一样的爱恨情仇和酸甜苦辣，有着同样需要尊重和关注的精神世界。我们知道，无论中西方，明眼作家写盲人多少有点“隔”，为了克服这种“隔”，通常是将小说写成象征或预言，是升华也是闪避。然而毕飞宇却闭上眼睛，反其道而行之，“让盲人在没有光的世界也要好好活”，遂成就了这部非凡脱俗的大器之作。

在普通人的印象中，盲人是自闭的、敏感的、脆弱的，与社会是有一定距离的，健全人与他们也是隔膜的。《推拿》这部小说让我们看到了盲人在当今社会中真实的生活，包括他们怎样在商品大潮中打拼、抗争，更重要的是触及了他们的情感，他们有爱，有恨，也有为了生存所采取的各种手段。

阅读了《推拿》，也阅读了盲人。感谢毕飞宇和他的《推拿》。

刘醒龙，他做到了  
□杨柳

# 对生命的敬畏与悲悯

□曹元勇

莫言的《蛙》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作为这部长篇小说的责任编辑，我由衷地为莫言感到高兴，同时也觉得颇为荣幸。

我本人与莫言交往已有十余年。初次见到莫言，要追溯到1998年的初春，我刚进上海海文艺出版社做编辑不到一年的时候。那之后，便几乎每年都要见上一两次。随着与莫言见面次数的增多和对他作品的不断阅读，我不仅越来越深入地折服于他那令人惊叹的旺盛想象力和创造力，而且也越加强烈地为他身上的谦卑品格所感染。我发现，对莫言来说，谦卑绝不仅仅是一种为人处世的美德或姿态，它同时也使他获得了一种观察现实和世界的独特方式。他把这种谦卑自觉地渗透进了他的所有写作之中，无论是在他的小说还是散文中，那种文绉绉的中产阶级知识分子式的精英意识是不存在的。自觉的谦卑使他不再需要故弄玄虚的文字游戏，而是把写作的根直接扎入了既复杂又深厚的民间土壤。这种认识使我对莫言的作品由衷地敬服和喜爱；也因此，在莫言的信赖和支持下，我从2000年编

《蛙》是莫言的第11部长篇小说。2009年8月下旬，在收到这部新作的电子稿之后，连续3天，我完全沉浸在这部结构令人耳目一新、叙述语言也一改以往风格的新作之中。我记得，读到第四部和第五部的时候，我的心情特别沉重，有种如同置身非人世界的无奈、绝望和疼痛。因为《收获》杂志当年第6期要刊发的原因，我们出版社需要等到12月份才能正式出书，这也就给了我们与莫言针对书稿进行深入交流的时间。当然，对莫言这样非常成熟的作家，我作为图书编辑也谈不出什么具有建设性的意见。只记得，当时针对小说的题目应该叫“蛙”，或是“姑姑与蛙”，或是别的题目，与莫言讨论、斟酌了很久。

在我的阅读中，第一感觉很重要。第一感觉是实实在在的、非常个人的审美活动，是无关乎社会和意识形态的纯粹的生命体验。我称之为“发生的存在”。而后来的评论和解读，则大抵是受某种外在的语境和环境影响，偏离了最初的文本体验。对于编辑来说，美只发生在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互动，发生在灵魂与灵魂的碰撞和交流中。碰撞的效果和层次，决定了小说的传播效果和品质层次。刘震云的《一句顶一万句》属于那种必须一口气读完，然后带着疑问读第二遍，之后便有拨云见日、醍醐灌顶的快感。

该书是刘震云酝酿创作了3年的小说，也是他迄今最成熟、最大气的作品。

小说的叙事风格类似明清的野稗日记，语句洗练、情节简洁、叙事直接，有汪曾祺和孙犁等前辈作家遗风。该书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构成言说的艺术，都能拧出作家的汗水。更为重要的是，作家惟有用此语言，才能对应和表现作品的内涵：与神对话的西方文化和人类生态，因为神的无处不在而愉悦自在，人与人之间虽说来说去不多，但并不孤独；与人对话的中国文化便伴随一生。心灵的疲惫和生命的颓废，

# 一句胜过千年

□安波舜

和浮生百姓，却因为极端注重现实和儒家传统，由于其社群、地位和利益的不同，由于其人心难测和诚信缺失，能够说贴心话、温暖灵魂的朋友并不多，反倒生活在千年的孤独当中。这样的孤独体验每个国人都有。

小说的前半部写的是过去：孤独无助的吴摩西失去唯一能够“说得上话”的养女，为了寻找，走出延津；小说的后半部写的是现在：吴摩西养女的儿子牛爱国，同样为了摆脱孤独寻找“说得上话”的朋友，走向延津。一出一走，延宕百年。小说中所有的情节关系和人物结构，所有的社群组织和家庭关系，乃至对于性欲爱情，都和人与人能不能对话，对话能不能触及心灵、提供温暖、化解冲突、激发情欲有关。话一旦成了人与人惟一沟通的东西，寻找和孤独便伴随一生。心灵的疲惫和生命的颓废，

以及无边无际的茫然和累，便如影随形地产生了。

为了摆脱这种孤独和累，书中的人们努力制造着声响和热闹。于是，喊丧便成了书中主人公杨百顺崇拜的职业。与戏子手谈，成了县长的私宠。但这无法改变书中人物的命运。就像今天，我们的民族还在继续为此付出巨大的成本和代价一样。不管你导演了多少大的场面，也不管你举行了多少个庆典。因此，阅读该书是沉重和痛苦的，它使我们在《论语》和《圣经》之间徜徉，在与神对话还是与人对话的千年思考中徘徊……

当然，阅读该书也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执著和顽强。为了在精神上有所依托和慰藉，人们义无反顾地追逐“一句顶一万句”的身影，很像祖辈弯曲的脊背和那一大片脊背组成的苍穹。

《天行者》的故事很沉重，中国的乡村教育本来就是一个沉重的话题。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界岭小学的现实仿佛是这句话的反证。刘醒龙在小说中令人窒息地描写了界岭小学的苦穷和艰难，同时也传达出明确的信息：在穷苦艰难的巨石重压下，良知的力量、希望的微光，丝丝缕缕没有断绝。凤凰琴还能弹响，雪笛依然悠扬，《天行者》——筚路蓝缕的乡村教师——背负着无法与他们的收入对等的责任和义务，依然在那里不遗余力地教书育人。

刘醒龙从小在山里长大，他的感情归宿、他的记忆的根都深藏在大山之中。他的基本教育就是在界岭小学这样的乡村学校完成的，余校长、孙四海、邓有米，就是他的启蒙老师。当他成为一个作家，他不能不写《凤凰琴》，不能不写《天行者》，他有责任为他的学校、他的老师树一座纪念碑，修一部奋斗史。现在，他做到了。

茅盾文学奖是中国文学最高的荣誉。得到这个奖，说明作家的文学成就得到认可，首先值得祝贺。刘醒龙正当壮年，对他来说，茅盾文学奖最重要的意义应该是创作上的更高追求。听说他正在写一部新的长篇小说，那是值得期待的。

**(上接第十版《推拿》评论)**一个社会永远不可能缺少批判，但如果一个社会只有批判这样一种动作，那可能也是一种畸形甚至灾难，怀疑、质难、批判，如果缺乏理性的规约，如果总是弥漫着非理性的愤怒，它所酿成的社会情绪就会遮蔽、甚至伤害许多善良与美好的事物。大概谁都不会想到，现如今，本来与勇气和孤独为伴的批判会成为哗众取宠的媚俗。以文学而言，我们正在丧失正面书写的能力。也许，人们早已忘记了古典时代的写作经验，即从写作的难度上说，描写苦难与愤怒固然不易，但歌颂正面、传达美好更难。古人说，穷苦之辞易好，而欢愉之辞难工，说的是这个道理。

从长篇小说写作的角度看，《推拿》所提供的经验将会慢慢显现出来，它呈现出的是一种新的长篇气质，一种与当今天生活同步的美学形式，一种与传统拉开距离的现代步伐。从传统看，长篇小说与历史有着割不断的渊源，它的结构、时间、人物命运与故事的支持实际上都是由外部世界提供的，甚至直接是由外部的历史事件构成的。以中国当代长篇小说而言，史诗是作家们的梦想，中国现代史上的重大事件也一直是小说家们追逐的题材和结构小说的要素，以至于形成了叙事的模式化。当外部世界不能为我们提供戏剧性的事件时，我们的故事从哪里来？看看欧美，包括近年来与我们交流甚多的日本、韩国的小说创作，我们应该意识到他们已经完成了这种小说现代化的转型，完成了小说与现实生活同步化。其实，中国的许多小说家特别是年轻的小说家们已经开始了自己的创作，但或许是未能提供较为成功的文本，更重要是因为传统长篇小说美学的歧视，这样的创作一直没有进入主流。《推拿》的出现提供了使这一新的小说美学站到前台的机会。作品以人物来划分章节，以时间为经，以人物的命运为纬，织成了一个立体的小说世界。它挣脱了传统长篇之“重”，同时又躲开了时尚小说之“轻”。这样的写作终会使长篇加入到当下思想者的行列，成为真正的时代之音。

**(上接第十二版刘醒龙访谈)**

记者：从成名作《凤凰琴》开始，到被文坛称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分享艰难》等作品，到本次获奖的《天行者》，您在创作中一直表达着对现实的关注。现实主义是否一直是您的文学信念？

刘醒龙：在我看来，现实主义其实是一种精神，不只是一个创作方法。长期以来，因为“工具论”的不良影响，现实主义在中国被妖魔化了。

我自认为是一个有理想的现实主义作家，或者说具有浪漫精神的现实主义作家。在骨子里，我的小说更多的是表达对现实的质疑。《天行者》中有这样一个细节：张英才将界岭小学的情况写成了一篇新闻稿投给报社，报社派记者暗访核实之后，许诺要把这些感人事迹在省报的头版头条刊登出来。结果是，这篇报道虽然发在报纸的头版，却不是头条，头条是“大力发展养猪事业”。这个细节其实表达了一种强烈的批判，用一句通俗话说：乡村知识分子竟然连猪都不如。作家要做的事就是把人物写好，把细节写好。直接喊出来就不是文学了。小说不是大字报，现实主义更不是大字报。

**(上接第十二版毕飞宇访谈)**

记者：您是否希望通过《推拿》传达给读者这样的观点：其实残疾人和健全人没什么不同，不要总以怜悯和同情的眼光去看待他们；其实我们每个人也都有着不同的缺憾和不完美之处。

毕飞宇：每一个人都不全是的，都有自身的局限，我们不该为此遗憾，相反我们应当为此骄傲。“回眸一笑百媚生”，多美，为什么要“回眸”？因为我们的后脑勺没有眼睛，这就是局限，这也是美。但问题是，我们时常不愿意正视自身的局限，我们更愿意相信自己的“万能”，它容易导致狂妄的人生和狂妄的社会行为。写完《推拿》，我对局限有了更加全面的认识，我都有点喜欢局限了。我喜欢有局限的经济、有局限的发展、有局限的权力。

残疾人是生理上有局限的人，他们有他们的不便，但是，我们这些同样有局限的人为什么要放大别人的局限呢？《推拿》刚发表的时候，有记者问我：你写的残疾人为什么不像残疾人呢？我问他，你以为残疾人是一个特殊的人种吗？你能不能告诉我残疾人“应当”是什么样的人？他没有能回答我，我很高兴。许多事情都是一层纸，它所缺少的就是轻轻地一击。

但不要误会，我现在谈的是对待生命的态度，不是社会福利，更不是慈善、制度，那是另外的一个话题。帮助残疾人、帮助弱者，从来就是生命的一个部分，那不是赏赐，只是爱我们人类自己。每个人都有得到善待的权利，每个人都应有善待他人的义务。

记者：您曾在特殊教育学校任教，这段经历对您创作《推拿》是否有帮助？

毕飞宇：的确，我曾是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校的一名教师，不过这段经历与《推拿》的创作没有直接联系，毕竟我的学生不是有障碍人士，他们是健全的，但是，教师生涯对我的人生和写作有影响。我的父母都是教师，我的两个姐姐也做过教师，我的太太至今还是教师，我来自真正的“教师之家”。我和我的家人都不足以为人师表，但是有一点我可以肯定，我们都洁身自好。教师这个职业有一个特点，它会逼着你长羽毛。我喜欢羽毛，我敬重每一个有羽毛的人。我认为这是一种积极健康的生活态度。

记者：最近您有什么新的创作计划？

毕飞宇：我一直在写一本新书，很遗憾，进展不好，这也是常有的事。好在我的耐心不错，慢慢写。

**(上接十二版刘震云访谈)**《红楼梦》里有个片段特别好，就是一个家常的细节——元春回贾府省亲，一切都得按照皇室的礼仪来，她的奶奶、父母长辈都得给她磕头。好不容易礼数都完了，她跟贾母王夫人说：“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一句很简单的实话，对不对？可是在那个情景和氛围下面，就有力量；然后元春见到了宝玉，第一句话就是：“比先竟长了好些……”就是说这孩子长这么大了，也好看。这就是曹雪芹高明的地方，那么大的排场下面插进来这两句点睛的、家常的实话——这就是实话的力量。其实有太多人把语言等同于华丽的外衣，这是错的，语言的叙述前进的过程应该是一个逐步扔掉所有形容词的过程。刘震云一直都相信，最好的语言就是“一句顶一万句”的语言，它只需要讲出来那个最简单和朴素的真实就够了。

刘震云的作品结出了一个活色生香的中国人伦人情网，充满了俗世生活的烟火气，却又无时无刻不在试图撕破这张网。《一句顶一万句》是中国世态百相的工笔，也是写意，它的价值和意义不仅是工笔，更是写意之中的蕴含之意。对此，刘震云说：“中国的确是个‘人情社会’。人情可以说是中国社会的根本。在西方，欧洲和北美，人和人之间相处，背后都有个原则。可是在中国不是这样的，作用于人和人之后的东西，是模糊又含混的感情。人情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它是主观的，这个社会每个人都那么主观。一个人太容易在事实面前，放弃一切的真理、原则、对错，而选择感情。人情是产生‘腐败’的基础，人情会使‘腐败’变成一件愉快的事情。‘腐败’当然是件坏事，但是这个过程伴随着很多的愉快和人情。我1989年写的那篇《官场》，写的是‘腐败’这件事情背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我在写‘腐败’，后面的那种感动。这就是我的小说所写的真实。”

《一句顶一万句》的写作过程使刘震云认识到，作者